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

情系梁菽 卢良恕传

宋彬 沈鉴宇 孙素芬◎著



1943年
考入金陵大学

1947年
任职中央农业实验所

1958年
育成“华东6号”系列小麦品种

1982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1994年
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任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

情系梁菽

卢良恕传

宋彬 沈鉴宇 孙素芬◎著

K826.3
1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系梁寂:卢良恕传/宋彬,沈鉴宇,孙素芬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13-10548-6

I. ①情… II. ①宋…②沈…③孙… III. ①卢良恕—传记 IV. ①K8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5837 号

出 版 人	韩建民 苏 青
责任编辑	张雯婷
责任营销	陈 鑫
版式设计	中文天地

出 版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 编	200030
发行电话	021-64071208
传 真	021-64073126
网 址	http://www.jiaodapress.com.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78 千字
印 张	19
彩 插	3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313-10548-6/K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

主 任：杜祥琬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巴德年 陈佳洱 胡启恒 李振声

王礼恒 王春法 张 勤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丛书组织机构

特邀顾问（以姓氏拼音为序）

樊洪业 方 新 齐 让 谢克昌

编 委 会

主 任：王春法 张 藜

成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艾素珍 曹振全 董庆九 胡化凯 韩建民

景晓东 李虹鸣 廖育群 罗 晖 吕瑞花

苏 青 王康友 王扬宗 夏 强 张柏春

张大庆 张 剑 张九辰 周德进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张 藜 许向阳

副主任：许 慧 张利洁 刘佩英

成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崔宇红 冯 勤 何继红 何素兴 李金涛

李俊卿 李惠兴 刘 洋 罗兴波 沈林芑

万红军 王传超 言 挺 余 君 张晓华

周 勇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简介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是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由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于 2010 年正式启动，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文化部、国资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 11 部委共同实施的一项抢救性工程，旨在通过实物采集、口述访谈、录音录像等方法，把反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的关键事件、重要节点、师承关系等各方面的资料保存下来，为深入研究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宣传优秀科技人物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原始素材。按照国务院批准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实施方案》，采集工程一期拟完成 300 位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的采集工作。

采集工程是一项开创性工作。为确保采集工作规范科学，启动之初即成立了由中国科协主要领导任组长、12 个部委分管领导任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采集工程的宏观指导和重要政策措施制定，同时成立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负责采集原则确定、采集名单审定和学术咨询，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承担具体组织和业务指导工作，建立专门的馆藏基地确保采集资料的永久性收藏和提供使用，并研究制定了《采集工作流程》、《采集工作规范》等一系列基础文件，作为采集人员的工作指南。截至 2012 年底，已

启动247位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获得手稿、书信等实物原件资料21496件，数字化资料72310件，视频资料96582分钟，音频资料104289分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采集工程的成果目前主要有三种体现形式，一是建设一套系统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数据库”（本丛书简称“采集工程数据库”），提供学术研究和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家之用；二是编辑制作科学家专题资料片系列，以视频形式播出；三是研究撰写客观反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研究报告，以学术传记的形式，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出版。随着采集工程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将有更多形式的采集成果问世，为社会公众了解老科学家的感人事迹，探索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提供客观翔实的史料支撑。

总序一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韩启德

老科学家是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生动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科技事业与科技教育的进展，本身就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近年来老科学家相继辞世、学术成长资料大量散失的突出问题，中国科协于2009年向国务院提出抢救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的建议，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并明确责成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根据国务院批复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实施方案》，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文化部、国资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11部委共同组成领导小组，从2010年开始组织实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文献与口述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录音录像、实物采集等形式，把反映老科学家求学历程、师承关系、科研活动、学术成就等学术成长中关键节点和重要事件的口述资料、实物资料和音像资料完整系统地保存下来，对于充实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文献，理清我国科技界学术传承脉络，探索我国科技发展规律和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弘扬我国科技工作者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

社会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采集工程把重点放在年龄在 80 岁以上、学术成长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以及虽然不是两院院士、但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老科学家的关心和爱护。

自 2010 年启动实施以来，采集工程以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对科技事业负责的精神，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获得大量反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的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和音视频资料，其中有一些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弥足珍贵。

以传记丛书的形式把采集工程的成果展现给社会公众，是采集工程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期待。在我看来，这些传记丛书大都是在充分挖掘档案和书信等各种文献资料、与口述访谈相互印证校核、严密考证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内中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照片、手稿影印件等珍贵图片，基本做到了图文并茂，语言生动，既体现了历史的鲜活，又立体化地刻画了人物，较好地实现了真实性、专业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通过这套传记丛书，学者能够获得更加丰富扎实的文献依据，公众能够更加系统深入地了解老一辈科学家的成就、贡献、经历和品格，青少年可以更真实地了解科学家、了解科技活动，进而充分激发对科学家职业的浓厚兴趣。

借此机会，向所有接受采集的老科学家及其亲属朋友，向参与采集工程的工作人员和单位，表示衷心感谢。真诚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读者的喜爱，希望采集工程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支持。我期待并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采集工程的成果将以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给社会公众，采集工程的意义也将越来越彰显于天下。

是为序。



总序二

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

由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直接启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科学院等 12 个部门和单位共同组织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是国务院交办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件大事。值此采集工程传记丛书出版之际，我向采集工程的顺利实施表示热烈祝贺，向参与采集工程的老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按照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实施方案》，开展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录音录像、实物采集等多种方式，把反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史的重要资料保存下来，丰富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资料，推动形成新中国的学术传统，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在全社会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通过实施采集工程，系统搜集、整理反映这些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的关键事件、重要节点、学术传承关系等的各类文献、实物和音视频资料，并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国际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背景加以梳理和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新中国科学发展的进程特别是老科学家所在学科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利于发现老科学家成长成才中的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关键因素，探索和把握高层次人才培养规律和创新人才成长规律，更有利于理清我国科技界学术传承脉络，深入了解我国科学传统的形成过程，在全社会范

围内宣传弘扬老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卓越贡献和高尚品质，推动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和创新文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采集工程不仅是一项文化工程，更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学术建设工作。

中国科学院是科技事业的国家队，也是凝聚和团结广大院士的大家庭。早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举产生了第一批学部委员，1993年国务院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学部委员到院士，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制度化进程，在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目前已接受采集的老科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即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其中既有学科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有作出过重大科学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更有毕生在专门学科领域默默耕耘的一流学者。作为声誉卓著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以发展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为己任，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杰出的科学教育家，他们着力培养、大力提携青年人才，在弘扬科学精神、倡树科学理念方面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成长经历既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通过采集工程为老科学家树碑立传，不仅对老科学家们的成就和贡献是一份肯定和安慰，也使我们多年的夙愿得偿！

鲁迅说过，“跨过那站着的前人”。过去的辉煌历史是老一辈科学家铸就的，新的历史篇章需要我们来谱写。衷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能够通过“采集工程”的这套老科学家传记丛书和院士丛书等类似著作，深入具体地了解和学习老一辈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中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继承和弘扬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在推动科技创新和国家建设的广阔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白嘉礼

总序三

中国工程院院长 周 济

由中国科协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是一项经国务院批准开展的弘扬老一辈科技专家崇高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重要工作，也是我国科技界的共同责任。中国工程院作为采集工程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能够直接参与此项工作，深感责任重大、意义非凡。

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科技工作者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决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工程科技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两弹一星、三峡工程、高速铁路、载人航天、杂交水稻、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一项项重大工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祖国富强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这些伟大的重大工程成就，凝聚和倾注了以钱学森、朱光亚、周光召、侯祥麟、袁隆平等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科技专家们的心血和智慧。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攻克无数技术难关，潜心开展科技研究，致力推动创新

发展，为实现我国工程科技水平大幅提升和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民，自觉把个人事业融入到国家建设大局之中，为实现国家富强而不断奋斗；他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用科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铸就了辉煌；他们治学严谨，鞠躬尽瘁，具有崇高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是我们后代学习的楷模。科学家们的一生是一本珍贵的教科书，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淡泊名利的崇高品格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和敬仰。

通过实施采集工程，把反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重要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和音像资料保存下来，把他们卓越的技术成就和可贵的精神品质记录下来，并编辑出版他们的学术传记，对于进一步宣传他们为我国科技发展和民族进步作出的不朽功勋，引导青年科技工作者学习继承他们的可贵精神和优秀品质，不断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推动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营造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工程院是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集中了一大批成就卓著、德高望重的老科技专家。以各种形式把他们的学术成长经历留存下来，为后人提供启迪，为社会提供借鉴，为共和国的科技发展留下一份珍贵资料。这是我们的愿望和责任，也是科技界和全社会的共同期待。

周济

序^①

1924年11月,我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赴美国学习经济与金融管理,后在大学教书,母亲也受过高等教育。虽然父亲早逝,长期从事财会工作的母亲收入微薄,但她省吃俭用,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使我和弟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我的中学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家乡沦落,一家老小只能随着外祖父背井离乡,一路逃难,从杭州到长沙,再到桂林,颠沛流离,几经辗转,最后到了贵阳。国难当头,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救国论”,“科学救国”就是其中之一。逃难路上的所见所闻使我常常思考:只有科学发达才能救中国;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能民众安康。从贵阳清华中学毕业后,我和家人商讨今后的发展方向,曾留学英国并成为中国早期著名的造船专家和北京大学校长的外祖父胡仁源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国家要兴旺发达必须同时有发达的工业和发达的农业。因此他主张我和弟弟,一人攻读农业,一人

① 本文是中国工程院学部工作部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一书中卢良恕院士自述部分的内容。采集工作开展时,由于身体的原因,卢良恕院士无法亲自执笔为本报告写一篇序言,甚为遗憾。结合本书对于序言部分的要求,经过考虑,采集小组决定将此部分内容作为序。由于本文为20世纪90年代所写,因此,文中内容有时间的局限性,特此说明。另外,文中有一些细节与史实稍有出入,在此不一一指出,详见后文传记。

攻读工业。正好当时我有“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和“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加上受到当时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的姨妈胡瑜教授的影响，对于学习农业知识有着很大的兴趣。这样，我于1943年考取了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师从靳自重、吴绍暎、黄瑞采等著名教授，从此走上了一条投身农业、振兴农业的道路，与农业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在金陵大学四年多的学习中，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基础和专业知识。由于抗战时期后方物资匮乏，食品短缺，我常常靠稀饭、玉米糊、山芋干充饥，和许多同学一起忍着饥饿读书，每月只能吃到一两次肉食，主要是猪头肉，同学们把这叫“打牙祭”。我经常利用周末从姨妈家带回一些食物、书本，与同学分享。在学校，老师还时常带我们到农村调查和学习。我发现农民的生活比城市普通市民更加贫困，因而对农民的遭遇产生了更深的同情。当我对农民的悲惨境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我的求知欲更切，学习更刻苦，学习目的性更明确，因此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都学得扎实。更重要的是逐步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金陵大学几位老师的精心教育和培养使我终生受益。他们在讲课时经常对我们说，学习农业和研究农业，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和实际相结合，重视农民的丰富经验。中国地域辽阔，农业类型甚多，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有感性认识，更不可能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些思想对我启发很大，我感受很深，暗暗下了决心，为了我国的农业振兴，我要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了解民情民意，掌握我国各区域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和特殊规律。

1947年，我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随即由当时的系主任、著名的玉米专家吴绍暎教授推荐到前中央农业实验所（现为江苏省农科院）麦作系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工作，并由此开始了我的农业科研生涯。

1953年，我带领一个多专业结合的小麦工作组，深入安徽省宿县地区农村蹲点两年。刚刚解放的淮北农村，农业生产条件很差，抗灾能力尤其薄弱，常常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小麦亩产只有几十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偏偏在1953年4月中，一场春季晚霜冻害发生了，此时小麦正处于孕穗阶段。几天后，受冻的麦苗一片萎蔫。农民们看到一年的希望毁于一旦痛苦不堪，却又一筹莫展。目睹这一切，我和工作组的同志们也都心

急如焚。我们连续几天蹲在田头,一片一片麦叶、一棵一棵麦苗仔细查看,并运用阶段发育的理论对小麦的生育状况以及霜冻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及时的科学研究分析,提出了主茎与早生分蘖虽已死亡,但基部分蘖节上的潜伏幼芽仍可生长,并可保证一定产量。据此,我们向地区领导部门提出不必翻耕改种,只要通过追肥、浇水、加强田间管理等抢救措施,麦收仍然有望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当地领导的赞成和支持。不到一个月后,受灾的小麦恢复了生机,后来仍获得一定的收成。灾年没有成灾,当地干部群众十分感激,我也从心里更加感受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农业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域性,只有心系农村并亲临其境,才可能对全国的农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才会有发言权。

在淮北和江南农村蹲点多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飞跃,不仅为我的小麦研究工作,也为我后来从事农业科研管理和农业发展战略等研究工作奠定了广泛而又良好的基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小麦等作物的科学研究,结合农业科研具有区域性、周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我提出农业科技工作要坚持“科研—教育—生产”、“试验—示范—推广”、“试验场—实验室—农村基点”三个三结合的科学方法,由我撰写的《合理安排农业科学工作》一文发表在60年代初的《红旗》杂志上。这些理论观点和方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80年代初,我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当时正值拨乱反正,又一个科学的春天来临之际,农科院的广大科学工作者迫切要求稳定科研,深化改革,多出成果,多出人才,我也深感责任重大。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农业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农科院在“文革”期间丧失的元气逐步得到恢复,一批下放的研究所被收回,一些被撤销的研究所恢复了建制,并新建了一些代表学科前沿、与国际科技水平接轨的科研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发展也因此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个时期,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国内外农业科学发展的前沿动态,也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全国不同农业类型地区考察、了解情况,吸收全国农业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新经验。

十几年来,我每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农村考察,应不少省(市)政府邀请作学术报告,相互交流意见和信息,对区域农业发展问题做调研分析,并提出咨询意见。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我国东中西地区发展的差距拉大了,发展西部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于是近几年,我曾九上四川攀西,走遍了云、贵、川接壤的长江上游和珠江源头等地区,对西南资源“金三角”农业综合开发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两次去甘肃河西走廊考察甘肃农业;五到广西、云南、贵州贫困地区考察岩溶地区的农业生产。每到一处,都与当地领导座谈,或走村串户,深入了解地区的生态环境、地貌、自然条件、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水平,讲解科技在生产和脱贫致富中的作用,提出科技开发、科技扶贫的意见,供省、地、市、县的领导同志参考,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科学考察是很累很苦的事,长途跋涉,常常碰到的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泞,举步艰难,长时间坐车颠簸后,我在“文革”期间进“五七干校”下河挑河泥时落下的腰肌劳损就阵阵发作。晚上到了住处,还要及时消化各种材料,汇总各方面的信息,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做到融会贯通,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为地方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为地方发展作出贡献。许多同志,尤其在我身边工作的同志,出于对我的健康着想,建议我把一些省、市和农业单位的邀请能推就推一推。但我想,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为了各地农业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地发挥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辛苦一些也是应该和值得的。

80年代,我在多年的工作和考察实践中深入了解到,我国的人口与需求在不断增长,但人均耕地等资源却在不断减少。面对这种新形势,针对农业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我运用现代农业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的成果,主持开展了两个都有100多人参加的大型研究项目,即“粮食与经济作物发展研究”和“中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进行了微观与宏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和社会科学,我和我的课题组首先提出一些具有战略性的建议,如“人均粮400千克必不可少”;“把传统的粮食观念转变为现代的食物观念”;“在充分利用现有15亿亩耕地的同时,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广辟食物来源”;“种植业应从二元结构(粮食—经济作物)

转变到三元结构(粮食—经济—饲料作物)”等富有创新性的观点。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意见已逐步得到了国家和主管部门的重视和采纳,这些成绩是我们课题组研究的共同成果,也得益于多年来我在农业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以及长期理论上的积累。

到 90 年代初,在中国版图上,除台湾、西藏以外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已留下了我的足迹和汗水。1992 年,到台湾考察的机会终于来临,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吴大猷先生的邀请,我和吴阶平、谈家桢、邹承鲁、张存浩、李林、华中等七人作为大陆首批科学家访问台湾,对祖国美丽宝岛的农业生产、管理和科技现状有了全面的感性认识,也开拓了两岸农业界交流之先河。

访台成功归来不久,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邀请我带领专家组前往西藏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流域进行综合开发考察,帮助其搞好发展规划。当时我已 68 岁,同志们出于关心和好意,认为我难以适应高原气候,劝我别去西藏了。但我觉得多年的基层生活既磨炼了我的意志,也锻炼了我的身体,相信西藏的高原反应我也可适应。1992 年 7 月 28 日我带领专家组抵拉萨,在历时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到田间地头、去水库工地,考察了 13 个县、市,行程近 2 000 公里,最高到过海拔 5 000 米的农牧区,忍受了因高山反应带来的种种不适,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任务,并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在拉萨市为全自治区的干部作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学术报告,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重视。

从 20 世纪的 40 年代到 90 年代,历时 50 年,我才得以实现走遍全国的风愿,成为国内农学界最早的实现者之一,同时我还到过五大洲的 20 多个国家开会、讲学和考察,这对于学习先进、开拓思路也大有帮助。

谈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庭对我工作和事业的支持。我的妻子尹雪莉多年从事财会工作,不仅工作很出色,而且还在我常年外出的情况下,承担起全部家务和照顾、教育三个孩子的重任。现在,我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在事业上也都学有所成。因此,我一方面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也难以在工作上取得今天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也为自己的家庭幸福,子女事业有成而深感欣慰。